

陶纹探古

——浅谈我国史前陶器纹饰的研究

王宇慧

探讨文化间的亲缘关系,如杜占伟等发现辽东地区的水洞下层文化、后洼上层文化和小珠山中层文化都广泛施有刻划的横线纹、短斜线纹、人字纹等,应当属于一脉相传的另一文化系统,并以此为基点探讨该文化系统与周边考古文化的关系;或是关注不同考古学文化中陶纹的承继与发展,如盛起新认识到崧泽文化和良渚文化两个看似不同的纹饰系统实际上存在相承关系,良渚文化中陶纹的部分元素来源于崧泽文化的编织纹,之后演变为独特的“良渚模式”,并在此基础上改造、加工,成为玉器纹饰的重要组成部分;或是致力于陶纹的重要类别——彩陶的研究,如赵克福等将东北地区新石器时代的彩陶花纹纹样整体分为12类,并划分出4个阶段,得出东北地区“在积极吸收外来彩陶的同时,自身也进行了创造”和“向外输出”的结论,进而论证“彩陶成为连接新石器时代不同族群生活、艺术和思想的纽带”这一观点;或是立足陶纹类型学开展研究,如周丽将成都平原的史前陶纹分期,揭示其发展过程,提出纹饰具有一定的保守性,其发展进程与陶器形态的变化并不完全一致的观点,并在此基础上讨论成都平原史前文化的渊源。

伴随着科技创新与方法革新,陶器研究领域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变革。显微分析、X射线衍射分析、化学成分测定等技术手段的引入带来了诸多变化,如通过解析陶器的成分或结构,更准确地判定陶土来源,追溯陶器产地和利用计算机图像处理技术智能识别、计量岩相切片中的矿物,使大规模处理数据成为可能。这些变化自然也对陶纹的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部分研究突破传统。有学者运用统计学方法将陶器纹饰和陶器形态量化处理,从数据的角度解读陶器发展与纹饰变迁,结合定性和定量两个研究尺度解读史前人群的生产与生活状态,逐步趋近“透物见人”这一考古学的研究目标。在此情境下,围绕陶器生产标准化或专业化的讨论成为一个重要议题,其中评判专业化生产水平的一项重要指标就是陶器器表装饰的统一性,陶纹无疑成为这一研究领域的重点关注对象。陈继玲等基于哈民忙哈遗址出土陶器纹饰的分析,表明该遗址已经形成一定程度的半专业化生产模式,揭示出常见的陶纹是为了提高效率在生产过程中出现的附加值,而非制作者主观意识上为装饰进行的刻意行为。同时有些学者采用实验考古的方法复原陶器的生产过程,解析陶器的施纹工具与方式,如西北大学的硕士陈秋菊以东南沿海的贝制纹饰为研究对象,通过实验考古,模拟出贝齿印纹、贝刻纹、螺印纹这三种典型纹饰,并探究其类型、分布、发展过程及背后的原因和文化内涵。与此同时,在微痕分析技术的推动下,陶纹研究的精度得以大幅提升,发现愈来愈多陶器表面残留的加工痕迹,最近有研究成果表明留存的指纹印迹能够为阐释陶器生产中的分工体系提供线索。

现阶段,史前陶纹研究已取得可观成果,与此同时,

也存在一些问题值得注意和改进。陶纹按特征可以分为阴纹、阳纹和彩绘三大类,但是落实到具体的考古发掘简报或报告中,不同的撰写者有不同的命名体系和习惯,有人按照制作方式归为拍印、刻划、镂空、彩绘等几类,也有人根据纹样形态的具象化特征命名为篮纹、乳钉纹、涡纹等。这种类别混淆和命名方式不统一的情况严重阻碍了基于更大时空范畴的陶纹研究,宏观层面的讨论稍显不足。针对这一情况,四川大学的吴陶莹选取新石器时代的绳纹为研究对象,在广泛梳理考古资料的基础上,对中国南方与东南亚这一广阔区域内绳纹的类型、年代、分期、分区和谱系等展开系统研究,创造性地提出我国史前陶器绳纹“一个系统,两大核心,三次扩散”的观点。实际上,陶纹的制作方式不同、形象各异,有的纹饰还是复合型纹饰,单一标准、不分层次、不成体系的命名是不合理的,也很难支撑更深层次的研究需求,可以明确的是,目前采用的命名方式和体系仍需进一步完善。另外,目前发表的史前考古发掘资料中存在纹饰描述较为粗略、纹饰公布不够详尽、重特殊纹饰轻普通纹饰、重彩绘纹饰轻其他纹饰以及陶纹彩图少线图多等问题,且很多陶纹仅仅以拓片的形式呈现,单一且精细度不足,这些因素为更详尽的分类研究增添了诸多阻力。并且,往往同一种纹饰可能出现在不同类型的陶器上,同一陶器上的纹饰可以分为主体和次要纹饰,呈现出不同的排列方式,同种形态的纹饰在制作方式上也可能存在差异,在陶纹足够丰富的情况下,细致研究也许会有新的收获。同时,作为史前考古学研究中一个重要的交叉领域,陶纹研究吸引了民族学、社会学、艺术学等学科的广泛关注,这些学科从审美意识、符号意蕴、宗教含义等角度阐释纹饰背后暗含的深刻含义。但需强调的是,这些探索与尝试必须建立在层位学和类型学的基础之上,盲目的学科交叉未必必助益陶纹研究,坚持“从考古中来,向多学科中去”的研究理念,才能真正实现融会贯通、相互借鉴的学术目标。

陶器纹饰作为物质与精神的结晶,是陶器考古研究领域的重要分支之一。当前的陶纹研究,不仅聚焦在传统意义上的文化互动与交融分析方面,也在不断地革新求变,探索新的研究路径,众多研究逐渐关注生产分析、人类行为方式和社会发展等角度。可以说,陶纹是史前考古研究中不可忽视的宝藏,未来也值得学界投入更多的精力,发掘这一重要遗存在考古研究中的潜力,势必必要采纳更多元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如可以运用数字化技术修复受损陶纹并提取,之后利用3D建模和打印技术实现陶纹的复刻,从而建立中国史前分区、分时段陶纹数据库,在降低陶纹损耗的同时提升研究精度和广度。此外还可以关注诸如陶纹变化与制陶技术、文化发展进程的先后性、同种形态纹饰背后不同的制作方式等新课题,使陶纹成为真正意义上可以链接史前“物—人—社会”的纽带,促进史前陶器研究的高质量发展。

(作者系吉林大学考古学院博士研究生)

考古地层学、类型学在实践中的主观性与客观性

——以2023年吉林大学辕村田野考古训练班为例

何文竞 刘娟 卢烈炎

2023年8月至12月,笔者有幸参加了国家文物局2023年度田野考古实践训练班(吉林大学)。参加本次训练班的有来自全国12家考古资质单位的学员14名,其中男性学员8名,女性学员6名,学员年龄多在30~39岁之间,高等学历60%以上为考古(文博)专业,参加考古工作平均6~10年。根据学员的各方面的情况,我们基本可以代表目前国内一线工作人员考古发掘、整理以及初步研究的平均水平。通过田野发掘期间学员之间的讨论和对大家所完成发掘报告内容的对比,笔者对传统的地层学和类型学在实际运用过程中的主观性与客观性有了更清晰的认知。下面通过几个真实案例来做详细说明。

从表格中可以看出,大家所用的分类方法是一致的,都是按照器物口沿、腹部等的形态特征作为标准,但实际的结果很不一致。大的方面,学员丙按“类→型→亚型”分成三级,学员丁相对简单按“型→亚型”两级分类,学员戊则是除了“型→亚型→小亚型”分三级。细节方面,按了瓶三人都分成重唇口和葫芦口两型外,盆、钵、罐分出来的类型差异很大。

结语

通过上面的对比与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考古学常用的两个基本方法在实际应用中粗线条地来看当然有其客观的一面,但从细节上来看,受主观因素的影响也不可小视。

对地层的划分和判断,大多数情况下,虽然大家是比较一致,但当出现争议时,学员之间往往谁也说服不了谁,问题要么搁置,要么统一听从工地负责人的判断(这也是工地负责人一项重要的工作),虽然表面达成一致,但有主见的发掘者难免“口服心不服”。这不禁让我想起《夏鼐日记》中的一段内容——“昨天(1935年4月8日)南区向东打探沟,发现一个椭圆形坑,工人告诉梁先生(梁思永)‘这是废井’,被梁先生骂一声‘胡说八道’,定说是墓葬,今天发掘的结果,是废井无疑,可见有时工人的经验,比一个考古学家还有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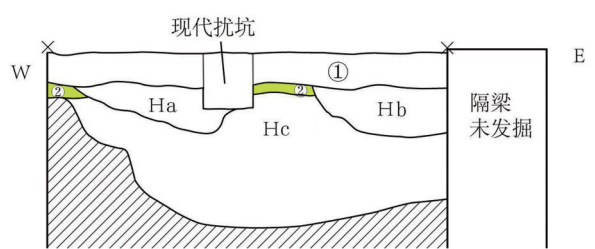
关于类型学,三位学员不同的地方是都将小口尖底瓶分成两型,所有器型也都没有进一步分式;不同的地方是盆、钵、罐三种器物虽然大家都以器物口、腹形态来分类型,但“弧、鼓、斜、直、卷、翻”等形容

词,再加上“略、微、较”等程度副词,主观性太强,无法统一标准,也就很难去评判到底哪种分类方案更优秀,结果只能是各说各话。笔者直观的感觉是,虽然我们对器物的分型花了大量时间,但相较于我们的分类,发掘报告中的器物图和照片价值更大,因为它们更客观。

在此需要说明一下的是,从理论角度来看,考古地层学与类型学本身并没有问题。笔者想表达的意思是,考古地层学、类型学虽然都是从自然科学中借鉴而来,但在考古学中它们的主观性要比地质地层学与生物类型学强得多;当然,考

古学也并不像一些前辈学者开玩笑说的那样——“考古考古,连蒙带唬”。与很多其他人文学科相比,考古学又是最强调客观的一门学科。

(作者单位:无锡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徐州市文物保护和考古研究所 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



	学员丙			学员丁			学员戊	
	A型:卷沿	Ba型:斜折沿		A型:弧腹罐	Ba型:深弧腹罐		A型:弧腹	Aa I型:沿面有凹槽
鼓腹罐	B型:折沿,方唇	Bb型:沿面斜唇缘一周凸棱	罐	B型:深腹罐	B型:折腹	A型:无沿口	Aa II型:沿面较为平直	
	Aa型:卷沿	Ab型:卷沿					Ab I型:沿面有凹槽	
	Ab型:斜折沿	Ac型:斜沿,沿面内凹,唇缘一周凸棱,与沿面交界处形成凸棱					Ab II型:沿面较为平直	
	Ac型:折沿,尖圆唇或圆唇,唇缘有凹槽	Ad型:折沿,沿面内凹,唇缘一周凸棱,与沿面交界处形成凸棱					Ac型:斜沿,沿面不突出,与腹部分果不明显	
折腹罐	A型:侈口	Ae型:折沿,方唇	罐	B型:深腹罐	Bb型:沿面较为平直	B型:折腹	Ba型:沿面有凹槽	
	Af型:折沿,沿面内凹,唇缘一周凸棱,圆唇	Ag型:折沿,沿面平,圆唇,唇缘中部有一道棱纹					Bb型:沿面较为平直	
	B型:侈口						C型:斜直腹折肩状	
直腹罐	A型:弧腹	Aa型:侈口,圆唇	罐	A型:弧腹罐	A型:无沿口	Aa型:弧腹	Ab型:折腹	
	B型:折腹	Ab型:侈口,圆唇或尖圆唇					Ba型:平折沿	
	C型:曲腹,侈口						Bb型:斜折沿与外壁相接	
	D型:斜腹,侈口,叠唇						C型:斜直腹折肩状	
弧腹盆	A型:侈口	Ab型:斜折沿	盆	B型:折腹盆	B型:有沿口	A型:弧腹	Aa型:侈口	
	Ac型:折沿,沿面略外卷,圆唇	Ba型:宽沿折腹盆					Ab型:侈口	
	Ba型:叠唇	Bb型:斜沿,圆唇					B型:浅弧腹	
	Bb型:折沿,圆唇	Bc型:近平沿					C型:浅斜直腹	
浅弧腹盆			盆	B型:折腹盆	B型:有沿口	C型:浅斜直腹		
鼓腹盆			盆	B型:折腹盆	B型:有沿口	C型:浅斜直腹		
小口瓶	A型:重唇口	Aa型:双唇明显,上唇较薄,下唇较宽	瓶	A型:重唇口	A型:重唇口	A型:重唇口	Aa型:重唇口	
	Ab型:上唇略凸出	Ab型:上唇略凸出					Bb型:重唇口	
	Ac型:上唇不明显	Ac型:上唇不明显					Bc型:重唇口	

同一小组三位学员器物分类对照表

关于整合文化历史考古与社会历史考古的思考

陈伟驹

考古学界通常把考古学文化时空框架与文化谱系的研究归为“文化历史考古”,把聚落考古、墓葬分析以及手工业研究称为“社会历史考古”。近年来,张弛提出,目前“这两套研究方法还缺乏相互间的内在联系,以致近年来史前考古凡是以‘文化与社会’为题的研究论述都不免有‘两张皮’之嫌”。为此,他提示,文化历史探讨文化或群体的来源与关系,是取自社会外部关系的角度;社会历史研究关心社会阶层、社会关系和社会革命,则是社会内部的问题;二者之间应有内在的联系(张弛:《民族与革命——百年中国考古学的研究取向》,《文物》2021年第6期)。这一概括从社会群体内部与外部关系的视角将文化历史考古与社会历史考古联系起来,对于整合两种范式的研究具有指导意义。

文化历史考古与社会历史考古的这种内外部关系首先可从中国新石器时代长时段的发展图景中得到初步验证。在新石器时代中期及晚期早段(距今约9000~6000年),各文化区的考古学文化分布范围都不大,不同考古学文化之间的交流尚不深入,交流的文化因素多限于个别器物。与这种外部关系格局相对应的是,各考古学文化的聚落基本属于规模不大的村落组织,其人群亦未见明显的社会财富或地位的分化和分层现象。进入新石器时代晚期中段(距今约6000年以降),不少考古学文化分布范围明显增大,考古学文化之间的交流更加深入,原本分属不同考古学文化的区域被整合在同一考古学文化的空间范围内;同时,文化交流的空间距离明显增大,出现了跨文化区、更大范围的文化趋同现象。同这种外部关系相应的内部社会结构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最突出的表现是出现了大型中心聚落,具有主从关系的聚落群、大墓和专业化手工业产品。这表明,此时出现了更大规模的社会组织单元、社会分化或分层以及专业分工现象。上述新石器时代不同时期的外部关系(文化历史)和内部社会结构(社会历史)很可能是互为因果的,有时甚至是同一社会现象的不同表现形式。

当然,要揭示文化历史考古与社会历史考古内在联系不能仅停留在上述宏观的层面,而要深入具体而微的个案研究中,将二者的关系更清晰地联结起来。要做到这一点,首先要统一叙事的主体。社会历史考古叙事主体通常是“人”,而文化历史考古常常以“物”的视角来表现。统一主体就是要将文化历史考古的叙事主体从“物”转变为“人”。中国考古学界呼吁多年的“透物见人”,在这一问题上同样适用。

现阶段的文化历史考古在叙述考古学文化外部关系时,常常无差别地使用“交流”“影响”等字眼。这种无差别表现在,不论是论述裴李岗时代还是仰韶、龙山、二里头时代不同文化关系时,抑或是描述强势考古学文化与弱势考古学文化的关系时,都一律以“交流”“影响”笼统概括。实际上,裴李岗时代一个考古学文化对另一个文化的“影响”,与处于国家组织中良渚文化与其他文化的相互“影响”,其背后的社会机制是截然不同的。再如,目前二里头文化中常见不少岳石文化的器物,反之则比较少见。从“物”的角度,当然可以说是岳石文化“影响”了二里头文化,但是考虑到二里头都邑和国家组织的存在,其文化与社会发展水平明显高于岳石文化,上述“影响”现象也可能是二里头都邑“虹吸效应”的结果。研究表明,二里头文化第三期及之前,岳石文化因素主要表现在二里头文化的高等级聚落(贺俊、张飞:《论豫西晋西南等区域的岳石文化因素》,《考古》2025年第5期)。这可能是“虹吸效应”存在的证据之一。被“虹吸”的主体只能是“人”。从这个角度看,实际上变成二里头文化“影响”了岳石文化的人群。这种视角将叙事主体从“物”转变为“人”,实际上也达到了统一文化历史考古和社会历史考古的目标,因为它将器物传播的现象与两个考古学文化的内部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联系起来。对于二里头文化四期到二里岗文化早期阶段出现的大量岳石文化因素,学界普遍认识到可能与夷商联盟灭夏的历史事件有关(同上引文)。这种将文化传播与文献记载历史事件联系起来是实现“透物见人”的一种重要方法。但是在论及文献记载匮乏的史前时期,除了个别研究外(如杨新敏、韩建业:《禹征三苗探索》,《中原文物》1995年第2期),要实现上述目标,常常面临较大的难题。这就更要求研究者要有意识地紧密联系社会内部结构与外部关系表现,以“人”的视角来代替“物”的视角,即以“虹吸”“战争”“贸易”等具体叙事来代替无差别的“交流”“影响”的抽象概括。

我们还可以举出更多的例子来论述文化历史考古和社会历史考古之间的关系。比如,学界很早就认识到,庙底沟文化或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彩陶以陕晋豫豫鄂境地区为核心,向外传播范围非常广,西至甘青地区,东抵海岱地区,南到长江中游,北达内蒙古地区。近年来,王炜林注意到,庙底沟彩陶与其常见半地穴五边形大房子共生共灭,并根据大房子的结构及其共存遗迹提出这种大房子是一种彩陶作坊(王炜林:《庙底沟文化“大房子”用途的新认识》,《考古与文物》2024年第3期)。这一认识为从规模与专业化生产、经济贸易的角度解读庙底沟彩陶的“抽象”传播提供了线索。与之类似的案例还有长江中游油子岭文化晚期陶器群的传播。据研究,关庙山遗址四期(相当于油子岭文化晚期)出现了快轮拉坯技术(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枝江关庙山》第868页,文物出版社,2017年)。这种技术的出现可能会引发制陶效率和规模的提升,这一背景以及由此引发的陶器贸易与此时油子岭文化陶器大范围传播很难说没有关系。

在距今5000年前后的仰韶晚期、良渚文化早期、屈家岭文化以及大汶口文化中期阶段,目前发现的南佐遗址、良渚古城、石家河古城、双槐树遗址、焦家古城等,多被认为已经进入文明或早期国家社会。与这一阶段社会历史发展相伴的外部关系表现是,相关地区出现了一场史前文化大迁徙现象,“使得北起长城沿线,南至岭南,西起黄河和长江上游,东至东海之滨,从文化的联系和认同上连为一体”(许永杰:《距今五千年前后文化迁徙现象初探》,《考古学报》2010年第2期)。这种“文化大迁徙”现象很可能与国家组织的出现互为表里,因为国家的出现与崩溃牵扯到战争、移民、逃亡。张莉曾提出,洛阳盆地二里头国家的诞生很大程度上是政治移民的结果(见《作为移民城市的二里头:考古所见夏中晚期徙民政策及其历史意义》,《南京大学学报》2025年第6期)。詹姆斯·斯科特论证过早期国家形成过程中,常常存在逃离国家统治的群体(《逃避统治的艺术》,三联书店,2016年)。向桃初曾指出,二里头文化末期该文化在南方的传播可能就是夏王朝覆灭时被动迁徙的产物(《二里头文化向南方的传播》,《考古》2011年第10期)。在某种程度上,文化历史考古所揭示的“早期中国文化圈”的形成与发展(韩建业:《早期中国:中国文化圈的形成与发展》,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与社会历史考古所揭示的中华文明的形成是同一历史进程的不同表现形式。换言之,从整合文化历史考古和社会历史考古的角度来说,探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起源与发展应当与中华文明的起源与形成结合起来研究。这或许是提出这一理论问题的重要意义所在。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人类学系)